

台灣文心雕龍研究烏瞰

牟世金 著

山東大學出版社



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

牟世金著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历下印刷二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

印张 4.5 字数 116千字

1985年 12 月第一版

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,200

书号: 10338·4

定价: 1.15元

前 言

台湾省的《文心雕龙》研究情况，祖国大陆的学术界一直是很关注的。中国《文心雕龙》学会成立之后，一直在谋求和台湾学者共同研究这一珍贵的民族遗产。我写这个小册子，即图向大陆读者做点初步介绍，以促进海峡两岸的共相切磋得以早日实现。

不幸的是，由于一峡之阻，两岸学者的相互了解至今甚微。就我自己来说，一九七九年才第一次在上海看到王更生的《文心雕龙研究》和黄春贵的《文心雕龙之创作论》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一九八三年组织《文心雕龙》考察团访日，我在日本期间，较多地看到台湾的有关著作，引起我进一步的注意。大陆的许多论著，包括我自己的在内，台湾“龙著”已列入“重要参考书”之内了，而我们不少研究者对他们还一无所知。回国后便一直设法搜集这方面的材料，除从北京图书馆、复旦图书馆等处借到我在日本未能购得的几种外，又承日本广岛大学杨启樵博士、东洋大学市村伊都子先生、京都大学釜谷武志先生等，陆续惠寄一些材料，特别是市村先生两次寄来四本，加上自己从日本购回的七八本，台湾《文心雕龙》的主要研究情况，便可得知其大略了。所以，这本小册子的完成，是首先要向日本友人深表谢意的。他们的热心相助，不能视为对我个人的友谊，而是对他们也相当重视的“龙学”，并对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寄以深意。我相信，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，也必以“雕龙”为桥梁而沟通和加深中日之间的友谊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即使得日本“龙友”之助，仍远远未得台湾

的“全龙”。好在古人有言：“第指其一鳞一爪，而龙之首尾完好，故宛然在。”大陆读者迫切希望了解台湾全龙，纵知一鳞半爪，全龙就宛然在目了。而两岸人民更迫切盼望的，是早得中国的全龙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于山东大学

目 录

前言

一、显学·····	2
二、校勘·····	10
三、注译·····	17
四、理论研究·····	30
1. 理论体系·····	30
2. 自然之道·····	37
3. 文之枢纽·····	43
4. 风格论·····	48
5. 风骨论·····	66
6. 三准论·····	72
五、主要论著·····	77
1. 王更生的《文心雕龙研究》·····	77
2. 黄春贵的《文心雕龙之创作论》·····	83
3. 4. 沈谦的《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》 和《文心雕龙之文学理论与批评》·····	85
5. 王金陵的《文心雕龙文论术语析论》·····	91
6. 龚菱的《文心雕龙研究》·····	94
7. 李曰刚的《文心雕龙斟诠》·····	98
六、发展民族文学·····	104
七、赘语·····	117
附录:	
台湾省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专书目录·····	123
台湾省《文心雕龙》研究论文目录·····	125

台湾《文心雕龙》研究鸟瞰

《文心雕龙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光辉遗产。它不仅一向为海内学者所珍视，也日益受到全世界文艺理论研究者的瞩目。三十多年来，台湾学者同样以此为祖国旷绝千古的“宝典”，在版本资料不足的情况下，对《文心雕龙》进行一系列认真的研究。就我所知，除个别人物在其论著中简单生硬地杂以政治问题外，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以严肃的态度，切切实实地坚持学术研究；有的数十年如一日，有的在和病魔搏斗之中，“自知生命快要结束”^①，仍未停止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。这种勤勤恳恳献身于“龙学”，而不为任何困难曲折所服的精神，是令人钦佩的。他们并非徒劳，确对“龙学”有一定的贡献。笔者力图就其所知，对台湾省《文心雕龙》研究的得失予以客观地述评。

^①徐复观《中国文学论集续篇自序》。

一、显 学

最早称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为当今“显学”的，是香港大学饶宗颐先生^①。七十年代以来，台湾研究者称之为“显学”的渐多。如沈谦以为：此书“堪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之论文巨著。近世以来，研究者甚夥，或校正版本，或讲疏章句，或发扬义理，绩效辉煌，遂成显学焉。”^②王更生也称，近数十年来，《文心雕龙》研究“蔚然成风，逐渐成为今日中国文学批评上的显学。”^③这种说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。台湾学者谈“龙学”，多从全中国的整体着眼，虽然他们对大陆情况所知甚微，因而难免有某些误解，但能以国家的整体观念来对待学术问题，则是正确的。他们视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为“显学”，正是如此。如王更生所论：“使《文心雕龙》得为中国当前文论中的显学者，以上各家都尽了催生的力量”。所谓“以上各家”，就是他在上文提到的王利器、范文澜、李曰刚、潘重规、刘永济、杨明照等^④。一九八〇年，台北出版《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粹》，其中也选入大陆作者刘绶松、刘永济、陆侃如、王元化、黄海章等人的论文十余篇^⑤。这都说明，他们认为“显学”的形成，是与大陆研究者的成就分不开的。

①《文心雕龙探原》，香港大学一九六二年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》。

②《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自序》。

③《近六十年来文心雕龙研究概观》，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》第七卷第三期（一九七四年三月）。

④《文心雕龙导读》九七～九八页。

⑤详见本书附录。凡引台湾诸书之出版时间、出版社，均见附录。

祖国大陆的《文心雕龙》研究，台湾省的学者也是颇为关注的。如对“文革”期间的停滞状态，他们曾发出“言之痛心”之叹。大陆学者在《文心雕龙》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，凡为他们所知者，往往能给以较为公正的评价。如李曰刚谓杨明照、王利器二书“集自来各版本各校本之大成，堪称《文心》之两伟大功臣”^①；王更生评杨明照的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：“这是杨氏呕心沥血之作。在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上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断代。”^②又谓“大陆上早期出版的几篇文章”，如许可的《读文心雕龙笔记》、刘绶松的《文心雕龙初探》等，“都是铿锵有节，掷地有金石之声的东西，只要是想研读《文心雕龙》的学者，对这几篇文章，是不会轻易失之交臂的。”^③又如评陆侃如先生的《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》说：此文“所涉范围虽然有限，但在这块新辟的荒原上，他的确是第一位拓荒者”^④。

对问题的研究，他们也往往着眼于全国。如王更生论“风骨”，首列十五家之说，除黄侃、范文澜、刘永济外，还有廖仲安、刘国盈、潘辰、舒直、王达津、罗根泽、李树尔等^⑤。此外，台湾出版的多种《文心雕龙》论著，都列范文澜、杨明照、王利器、刘永济、陆侃如、牟世金、郭晋稀等人的著作为“重要参考书”。这些情况说明，一峡之隔并未阻止一国两岸的学术交流，台湾学者仍能尽其所知而从全国范围来研究《文心雕龙》。这样，他们视“龙学”为“显学”，就有充实的内容了。

当然，台湾学者尊之为显学，也有该省具体的原因。对《文心雕龙》的珍贵意义作高度评价，在台湾学者中可谓众口一声。如李曰刚称：“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之规模，齐梁以前不曾有，齐梁以后未之见，于中国文学批评翰籍之中，震铄千古，迄今仍

①《文心雕龙鬚诠》十九页。

②《文心雕龙导读》七十页。

③④⑤均见王更生《文心雕龙研究》四一、五四、三二〇~三二八页。

无出其右者”^①；王更生则以为刘勰此书可“悬诸日月”^②；王叔岷说此书“非唯品藻之圭臬，亦文章之冠冕也”^③；龚菱更认为：“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实为我国文学的瑰宝，要研究中国文学，就必须研读这本书。要阐释传统作家作品，要研究我国文学理论，要探究文学批评，乃至要了解我国文学各层面，都要研读、参考《文心雕龙》这本书。”^④这些评价虽有溢美之处，却于此可见他们重视这部书的程度。有人以为《文心雕龙》年代已久，在今天还有什么可取之处？黄春贵斥这种观点“徒为有识者所嗤耳”^⑤，此可谓之知言。

台湾学者不仅给此书以高度评价，尚图“以为建立现代文艺理论之准的与借镜”^⑥；希望“能实际应用于今日，作为发展民族文学的张本”。^⑦因此，台湾多数大学的中文系都开设了《文心雕龙》选修课，张严还讲到有的大学“已列为文学部门之必修科目矣”^⑧。李曰刚先生长期在台湾师范大学讲授《文心雕龙》，不仅“初授诸生选修”，还“继导硕博专研”^⑨，培养了一批后继之才。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在台湾成为显学，这些都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一种学术的兴盛，主要还是人才，没有一批对《文心雕龙》研究有素的学者，台湾的“显学”是无由出现的。台湾的《文心雕龙》研究，大致以师范大学为中心，其中李曰刚、潘重规、高仲华、方远尧等教授，都是三十年代在南京中央大学受业于黄侃的

①《文心雕龙斟诠》二二八四页。

②《文心雕龙导读》四页。

③《文心雕龙斟记》见于大成、陈新雄主编《文心雕龙论文集》。

④《文心雕龙研究》三〇三页。

⑤《文心雕龙之创作论》一九八页。

⑥沈谦《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》一三八页。

⑦王更生《文心雕龙研究·例略》。

⑧《文心雕龙文术论序》。

⑨《文心雕龙斟诠·序言》。

门人。他们多年来相继在师大从事《文心雕龙》教学，培养出王更生、龚菱、沈谦、黄春贵等后起之秀。此外，台湾大学的廖蔚卿、郑骞，政治大学的张立斋、王梦鸥，东海大学的徐复观，成功大学的张严，辅仁大学的王金陵，以及毕业于师大，后来执教于淡江文理学院的黄锦鋐等，就是构成台湾《文心雕龙》研究队伍的中坚。台湾省的“显学”，主要就是这些学者的业绩。他们既自己从事研究，又培养成大批的人才。仅以培养硕、博研究生来说，其学位论文较著者有：

《文心雕龙之文学理论与批评》（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沈谦）

《刘勰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》（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纪秋郎）

《刘勰年谱》（辅仁大学中文系王金陵）

《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》（沈谦）

《文心雕龙批评论》（李宗谨）

《文心雕龙之创作论》（黄春贵，与上两篇同是台湾师大）

《刘勰明诗篇探讨》（中国文化学院中文研究所刘振国）

《刘勰钟嵘论诗歧见的析论》（陈端端）

《文心雕龙与儒道思想的关系》（韩玉彝，与上文同为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）

以上前两种为博士论文，其余为硕士论文；其中第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种已正式出版（详见书末附录）。这只是我所得知的一部分，已足说明台湾各大学是为当今显学输送了一些人才的。

徐复观教授曾说：“台湾（原注：大陆也是如此）年来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风气相当盛，刊出的专文专书也不在少数。”^①这是事实。台湾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专文专书，到一九八二年底，已出版论文集七种，校注译释十一种，理论研究十种，其它（年谱、导读）二种，总计三十种。论文截至一九八〇年共发表约

①《中国文学论集续篇》一七〇页。

二百多篇，其中考校笺释四十余篇，评介序跋二十余篇，“文之枢纽”部分二十余篇，文体论约十篇，创作论三十余篇，批评论十余篇，其它四十余篇。以作者而论，发表论文最多的是王更生，共二十余篇，次为张严、徐复观，各十余篇，它如李曰刚、沈谦、王梦鸥、陈拱、廉永英等，也在七、八篇以上。总计台湾曾出版专书和发表论文的研究者共九十余人。以台湾省有限的地域、人员和条件而论，《文心雕龙》的这个研究队伍是相当庞大的，其论著的成果也是相当可观的（还有一些大学教材、翻印前人和大陆著作未计）。

从以上种种情况来看，称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为当代中国之显学，也就诚非虚言了。下面便进而考察这一显学在台湾省的发展大势。

全省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专书，六十年代出版五种，七十年代出版十七种，八十年代的前三年便出版八种。论文的发表，五十年代六篇，六十年代五十余篇，七十年代一百三十余篇。这个数字显示了他们从七十年代开始，有愈来愈加强的发展趋势，也反映出台湾学者对《文心雕龙》研究的重视，正处于方兴未艾之中。王更生评李曰刚的《文心雕龙斟释》曾说：“今后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，或将由李氏《斟释》的带动，展开一个崭新的境界”^①。这本《斟释》（师大讲义）已于一九八二年正式出版，我们期待着台湾“龙学”，真能在此书的带动下，“展开一个崭新的境界”。

再从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。其校注译释方面的十一种，有九种出版于一九七六年之前，其后虽有王更生的《文心雕龙范注驳正》和李曰刚的《文心雕龙斟诠》二种，但王书重在驳议，李书不仅是综合性的著作，且是早已完成的讲义。所以，其校注译释工作，主要集中在一九七六年之前。理论研究方面的十种，则有

^①《文心雕龙导读》八四页。

八种出版于一九七五年之后。论文集七种，虽出版于一九七六年之前的较多，其中对某些理论问题已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探究，但如收入易苏民编《文心雕龙专号》中的《文心雕龙考索》（张严）、《神思注译》（钟升）等文，收入张严《文心雕龙通识》中的《文心雕龙五十篇指归考微》、《文心雕龙版本考》等文，黄锦铨等人的《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》中所收《文心雕龙五十篇赞语用韵考》（韩耀隆）、《文心雕龙用易考》（王仁钧）等文，也有不少考校注译的文章。至于陈维雄、于大成主编的《文心雕龙论文集》，多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论文，四九年以后的台湾作者之文只有两篇：一是潘重规的《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》，一是王叔岷的《文心雕龙斟记》，均非理论研究。七十年代中期之后，校注译释方面的论著，虽仍有继续问世之作，但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渐多了。如兰若天的《文心雕龙的枢纽论与区分论》，专论《文心雕龙》的上篇；王更生和龚菱各有一本《文心雕龙研究》，都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；沈谦先后出版了《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》和《文心雕龙之文学理论与批评》，前者专研究其批评论，后者综论全书；王春贵的《文心雕龙之创作论》，专究其创作理论；王金陵的《文心雕龙论术语析论》，专析其文论术语；冯吉权的《文心雕龙与诗品之诗论比较》，则究两书论诗的异同。这些事实充分说明，台湾的《文心雕龙》研究，以七十年代中期为分界线，前期以校注译释为主，后期以理论研究为主；理论研究又循着从部分到整体，进而深入某些专题研究的道路发展。这就是三十年来台湾省《文心雕龙》研究的发展大势。

王更生在一九七七年曾论及“文心雕龙学”的发展趋向。他认为在范文澜、王利器、李曰刚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“《文心雕龙》研究的方向，可以遵循以下六个途径去努力”：一、校勘，二、注释，三、文论，四、今译，五、资料集结，六、比较

研究。^①这六个途径，是考虑得很全面的，任何一个方面，都既不可忽视，也确有继续努力，精益求精的必要。只是鄙见以为，这六项不应轻重不分而一视同仁。作为“发展方向”来看，这种包罗万象的“途径”是四通八达的通衢，实际上无方可向，无向可趋。三十多年来，台湾“文心雕龙学”经历的实际途程，已把它的发展趋向显示得很清楚了。当然，一九七七年以后的事，王更生氏并未看到，也未预计到。

谁也不是算命先生，能预卜未来的天下大事。但我们搞学术研究的人，要充分尊重事实，并进而总结事物的必然发展规律。所谓“阴阳盈虚，五行消息，变虽不常，而稽之有则也。”这是刘勰便有的认识了。“稽之”龙学的发展，也是“有则”的。无论大陆和台湾，海内和海外，既曰龙学，就必有龙学的必然发展规律。如施友忠虽早有英译本问世，其译却不太理想；朱利安的法译本还正在翻译中。这样，在欧美诸国，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就必然成不了“显学”。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，校注译释都有较好的基础，理论研究便可迅速发展^②。一九八四年在上海召开的中日《文心雕龙》讨论会，他们可以组成以目加田诚为团长的十二人代表团参与此会。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在日本的汉学家中，也可谓之“显学”了。所以，必以校注译释为基础，才可能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，台湾大陆正是如此，这就是规律。校注译释必然转入理论研究，也是不可转移的规律。以翻译来说，日本有三种全译本，台湾也是三种，大陆四种。由于对原文理解不一而译文互有出入，今后继续有多种较好的译本出现是完全可能的，但译文的任务止于转达原意，新译本只能愈来愈少。校勘就更是如此。虽有“校书如扫落叶”的古语，绝不可能越扫越多。经过数百年来古今校勘家的努力，未校或误校的已不会太多了。而校注译释

①《文心雕龙导读》五三～六五页。

②参拙文《日本文心雕龙研究一瞥》，《克山师专学报》一九八四年第一期。

并不是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目的，它只是理论研究的基础。要使《文心雕龙》发挥作用于今日，只能是其理论中的民族精华。所以，龙学史の必然发展趋势，是逐步加深其理论意义的研究。

台湾学者绝大多数对《文心雕龙》研究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都是清楚的。王更生氏在理论认识上虽有模糊之处，但他的研究实践却是很明确的。其《文心雕龙研究例略》有云，他著此书，即图“俾此一部旷古绝今の宝典，真能实际应用于今日，作为发展民族文学の张本。”这既是多数台湾学者积极实践の正确道路，也是海峡两岸学者正共同前进的方向。台湾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，后面拟另作专题介绍。

二、校 勘

台湾学者对《文心雕龙》的校勘，虽限于当地的条件，但以其用力甚勤，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这方面的著作有张立斋的《文心雕龙注订》和《文心雕龙考异》，潘重规的《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》，王叔岷的《文心雕龙斟记》和《文心雕龙缀补》^①，蒙传铭的《文心雕龙校订》，以及李曰刚的《文心雕龙斟论》等，其中有的兼有校注，这里先谈校勘。

近数十年来《文心雕龙》的几个重要校注本，如范文澜的《文心雕龙注》、王利器《文心雕龙新书》、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》、刘永济的《文心雕龙校释》等，台湾都曾翻印出版^②。台湾学者的校注工作，主要就是在以上几种的基础上进行的。李曰刚《文心雕龙斟论例略》的第一条就说：

自来《文心雕龙》板本，以清乾隆六年（一七四一）姚刻黄叔琳辑注养素堂本为最善，今即以此为底本，再参以黄季刚师《礼记》、刘永济君《校释》，范文澜注所引孙仲容、顾千里、黄荛圃、谭复堂、铃木虎雄诸家校本，暨杨明照《校注拾遗》、王利器《新书》……期能折衷诸说，有益

①《文心雕龙斟记》原载新加坡大学《中文学会学报》第五期，收入陈、于主编之《文心雕龙论文集》，《文心雕龙缀补》即由《斟记》一文增订而成。

②《文心雕龙注》：台北明伦出版社于一九七〇年据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九六〇年之“增订本”影印，名《文心雕龙注增订本》。《文心雕龙新书》：台北成文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据香港龙门书店版影印。《文心雕龙校注》：台北世界书局于一九六二年据香港龙门书店版翻印。《文心雕龙校释》：台湾原传一九四八年的正中书局版，一九七四年台北华正书局又据上海中华书局本翻印。

斯书之董理。

李书如此，其他各家也基本相同。台湾学者在这方面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，但也有一些具体的成就，其功是不可没的。这里只就张立斋、李曰刚二家之校略予考察。

张立斋的《文心雕龙考异》，也曾“旁参《御览》及近世范文澜注本，杨明照校本，王利器《新书》”，但其自序，于三家均有微辞。其评王杨二书说：

二氏之作，于校讎则每失，于论断则频误。兹就唐本十余篇中，王氏失校者，有廿余条，杨氏失校者，达三百四十余条。如唐写本《辩骚篇》“汤武之祇敬”句下，原脱“典故之体也”，至“讽之旨也”，四句共廿二字。又《铭箴（应为箴）篇》“盖臧武之论铭也，”句下原脱“曰天子令德，诸侯计功，大夫称伐，”三句共十三字，二氏均未校出，谨细忽大，不见舆薪，为失之最者也。

对此，我以为首先要明辨校书的目的、任务何在，是以唐本校今本或以今本校唐本？张立斋的要求似为二者兼有。这种要求，只少数几种版本兼校互出，是不难做到的，而王杨二家以数十种版本相校（目的又只在校今本），欲求将此数十种之有出入者一一校列，那就既无必要，亦不可能。因此，张氏的所谓细之与大，是不切实际的。

其次，以张氏所斥“谨细忽大，不见舆薪”之二例来说，若非虚张声势，便是夫子自道了。倘论唐本之校，而不知前有赵万里，后有潘重规，那才真是“不见舆薪”。赵万里的《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》发表于一九二六年^①，潘重规的《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》出版于一九七〇年，赵潘之校都已指出唐写本的二处脱文，他们又都远在张校之前，却云“诸家皆未校出”，岂非“不见舆薪”？王杨二家纵然未见潘校，却是必见赵校的，赵万

^①载《清华学报》第三卷第一期。

里是专校唐本，王杨则是专校今本。所以，王杨二家之略，当是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

其三，张校唐本固有精到之处，其失校者同样不少。仅以《辨骚》一篇为例：除“名儒辞赋”等三处的“辞”，唐本均作“词”未校而可以不校外，“同于风雅”的“于”，唐本作“乎”；“酌奇而不失其贞”的“其”，唐本作“居”；“不有屈原”的“原”，唐本作“平”；“艳溢锱毫”的“溢”，唐本作“逸”，张氏《考异》均未校出。又，“驷虬乘翳”的“翳”，从铃本作“鸞”，而唐本实为“翳”。这种情形，用张氏《考异》的重点乃在据唐本以校今本来解释，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的，但对王利器、杨明照的评论，就应用同一尺度；其间区别，只在王杨所用校本特多，而张立斋特少，并以唐本为重点。

借刘勰的话来说，“虽欲訾之（圣），弗可得已”。王杨二书绝非尽善，只是“谨细忽大”之评，未免“轻言负诮”。但我们并不以此而忽视张立斋氏精勘细校之功。他的所补所正，确有一些人所未及之处。如《征圣》篇的“事迹贵文之征也”句，张云：“唐写本迹作绩。立斋按：《书·尧典》：‘庶绩咸熙。’传：‘绩，功也。’又蹟同迹。《诗·小雅》：‘念彼不蹟。’传：‘不蹟，不循道也。’二字义殊，唐本是，王失校。”《明诗》篇的“婉转附物”句，王校：“唐写本婉作宛”。“立斋按：唐写本正作婉，非作宛也，王校误识。”又如《诸子》篇的“陆贾典语”，王利器、杨明照、刘永济诸家，皆校“典语”应为“新语”。张立斋认为：“典语非误，下有《新书》字，故上称《典语》。”张书中象这类或为精细或系独见者是不不少的。如果注意到著者的处境和条件，便知其成绩是得之非易的。《文心雕龙考异》的自序有云：“王杨二氏校本，自述所据唐写本以下，王凡廿三种，杨凡十七种，余则唐写本以下，仅得其五，颇渐寒俭。”这就是台省学者的苦衷了。